

国际关系理论

前沿

译丛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 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S

: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美] 约瑟夫·格里科 著

[美] 约翰·伊肯伯里 著

王展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S :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美) 约瑟夫·格里科 著

(美) 约翰·伊肯伯里 著

王展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41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约瑟夫·M. 格里科,  
(美)G. 约翰·伊肯伯里著;王展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ISBN 978-7-301-13907-3

I. 国… II. ①格…②伊…③王… III. 世界经济政治学  
IV. F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778 号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opyright © 2003 b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Edition

书 名: 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

著作责任者: [美]约瑟夫·M. 格里科 [美]G. 约翰·伊肯伯里 著 王展鹏 译

丛书策划: 金娟萍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封面设计: 张 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907-3/D·20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开本 11.375 印张 346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委员会

主 编：赵宝煦教授，北京大学

副主编：秦亚青教授，外交学院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门洪华博士，中共中央党校

王 杰教授，北京大学

王逸舟教授，中国社科院

王缉思教授，北京大学

时殷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顾问委员会

主任：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教授，杜克大学  
委员(按英文姓氏笔画为序)：

江忆恩(Iain A. Johnston)教授，哈佛大学

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教授，康奈尔大学

斯蒂芬·D.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教授，斯坦福大学

海伦·V.米尔纳(Helen V. Milner)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教授，明尼苏达大学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哈佛大学

## 总序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任何知识谱系又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住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闪光的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生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编织了学理思想运动的脉络,形成了知识生成发展的宏线。国际关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显现出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宏线。仅从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核心内容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天地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成为无数国际关系学者毕其终生心血所奉献的事业。作为学者,他们探索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作为人,他们希冀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和人的幸福。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

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发表,到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虽然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沃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

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是高度稳定的因素,所以,国际冲突从根本上是不可更变的。现实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峰巅,标志性著作就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 1979 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沃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耀目的结构主义理论大厦。在战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1957)、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1959)、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的《界定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比价》(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等等。虽然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但是他们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减弱国际无政府性和因之产生的冲突。他们认为,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何种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战后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重大结晶,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可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

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鲁杰(John Ruggie)等人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3年,国际关系学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新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规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规制研究和争论的文章,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也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入了基欧汉和鲁杰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的抨击。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1993年,鲍德温(David Baldwin)编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文集,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天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Kenneth Oye)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6)、斯坦(Arthur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90)、鲁杰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1993)、巴赞和利特尔(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1993)等。如果说这些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可以具有同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话,这个特点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问世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



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它在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启迪和激发了20世纪90年代跻身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93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了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重要过渡性著作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建构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铺垫。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1992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它完全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也可以是友好合作,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冲突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学理辩论爆发了。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6年,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Ronald Jepperson)对建构主义理论的阐述,也收入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e)、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的优秀实证性论文。此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6)、凯克

(Margaret Keck)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的《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1998)、韦尔兹(Jutta Weldes)的《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属建构主义范畴的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1998年,《国际组织》在纪念创刊50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共同主编了专辑,全面阐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趋于成熟,一些学者开始将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称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包括非主流理论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线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学科的核心,也是智慧的精华。了解这些知识结晶,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大部分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还可以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走向。比如,从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十分迅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国际关系已经被许多人称为“显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20世纪90年代初,由周纪荣先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出版。这套翻译丛书贵在求精,尤其是收入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一部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另一部是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精品。这套译著的出版不仅引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功不可没。十年之后,王逸舟先生主编了《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将西方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新理念介绍过来,其中既有反映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重要著作和新现实主义学者的新作,也有建构主义的专著。这套译丛贵在出新,使我国国际关系学子又一次接触到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成为他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同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翻译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作《霸权之后》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也在策划翻译和出版国际关系类著述。这些努力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毕竟还十分年轻,对西方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也还是起步伊始,因此,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翻译缺乏体系,既没有充分注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也未曾有意识跟踪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宏线。比如,我们的翻译作品以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这样很容易使国际关系的学生和读者形成一种失之偏颇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也难免使人们受到现实主义一家之言过于强烈的影响,将其视为惟一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这些重要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学理思维和对国际合作的积极认识也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的知识谱系无法得到完整的再现,使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宏线在读者的认识和思考中出现断裂。进而,我们的译本多是根据译者自己的好恶作出的选择,这些译著之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散散点点,难以使读者进行系统的知识积累。并且,国际关系译著中既有学理性著作,也有政策性分析,更有对国际关系走势和天下事态的大论宏议。虽然满目尽好书,但却不能系统反映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统主体、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

据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其宗旨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为蓝图、以主流理论发展宏线为基准,以学理思想为根本,聚焦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交锋的前沿,重点译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

为了保证这一译丛的质量,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国际关系学著作翻译领域使用了中外方编委会合作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邀请我国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赵宝煦教授担任中方编委会主编,编委会成员都是我国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近十年内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和学理研究做出实实在在贡献的学者。他们既亲身经历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又谙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脉络。他们的加盟保证了这套译丛的系统性、学术性和前沿性。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还特意邀请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为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主任,并由基欧汉教授本人邀请了六名国际关系学界一流教授出任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领衔学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选定的每一本著作都是经过双方精心挑选和认真磋商之后确定的,尤其是基欧汉教授对每一本书精心推敲的负责精神,对保证译丛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的出版会使读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体系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认识,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使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向。我们也希望这套译丛成为国际关系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套译丛能够起到他山之攻错的作用,使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是为序。

秦亚青

2002年9月8日于京西厂洼

# 译者序： 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身份与共同 研究纲领的探索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而又充满争议的领域。如同任何应用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其发展、繁荣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某些学者在象牙塔里的设计，而是来自现实的需求。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概念从学术研究进入公共话语，人们的日常用品来自不同国度，世界范围资本市场一体化初具规模的背景下，对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间关系的研究显得尤其有现实意义。

以一个学科的标准衡量，IPE的发展显然还不完善、不成熟：按照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标准，它的不同研究纲领之间明显缺乏共同的学科硬核(hard core)；其各学派之间乃至学派内部在知识谱系、基本概念、核心理论、研究路径上都存在广泛的分歧。<sup>①</sup>一方面，这种研究纲领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为理论辩论开辟了空间，与来自现实的需求一道赋予其进一步发展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对于刚刚涉足这一领域的学生和年轻学者的进一步学习研究而言，则构成一定障碍。因而，编写教科书，确定相对稳定的理论内核和研究纲领则成为IPE建构学科标准和身份认同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IPE教学与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对IPE的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逐渐形成了学术共同体，编写了教科书，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逐步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sup>②</sup>但是，如同西方的IPE发展历程一样，我们对这一新兴领域的认识出现过，而且至今仍存在一些偏差和模糊之处。近年来，中国学者日益意识到，中国IPE的发展既需要虚心吸收西

<sup>①</sup> 参见：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

<sup>②</sup> 同上书，第37—39页。

方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又需要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现实，增强问题意识，研究 IPE 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和平发展融入国际体系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形成中国视角和中国特色，为 IPE 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书是由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著名学者杜克大学教授约瑟夫·M. 格里科和乔治敦大学 G. 约翰·伊肯伯里联袂完成，出版后，立刻成为美欧 IPE 教学和研究的教材和参考书，对于中国学者理解西方 IPE 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

##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身份与理论的融合

20 世纪 70 年代斯特兰奇“发现”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相互忽视”的重要现象。<sup>①</sup>几乎与此同时，基欧汉和奈将经济学中的相互依赖与政治学中国家的自主性这一命题联系起来，标志着 IPE 的兴起。<sup>②</sup>

此后，与国际关系理论同步发展的美国学派成为 IPE 的主流，但同时也面临英国学派和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更加激进的批判学派的挑战。尽管目前各学派在研究纲领方面远未形成共识，但 90 年代以来，其知识谱系日渐清晰。一些学者逐渐改变了 IPE 只是国际关系一个子学科的认识，开始从更加广阔的学科背景中寻求灵感：<sup>③</sup>古典政治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学都成为 IPE 的重要理论渊源。但是，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学派和批判学派在与这些“经济”理论的结合上则是各取所需的。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可上溯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学说；而批判学派则以马克思主义以及沃勒斯坦的依附论和葛兰西的政治社会学等学说作为其批判的工具。同样重要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的 IPE 研究在传统的重商主义/国家主义、马

<sup>①</sup> Susan Stran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 No. 2, 1970.

<sup>②</sup> 参见：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sup>③</sup> Geoffrey Underhill, “State, Market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 (Inter-?)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 2000.

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理论的融合,关注具体的问题领域,在关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新特点的同时,环境保护、国际劳工标准等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在此背景下,IPE 如果仅停留于泛泛地将政治学 and 经济学简单叠加,或者将其简化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成本收益算计或效用最大化,都不利于学科身份的确立,它迫切需要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借鉴,打破学科间的藩篱,形成主流的研究纲领,科学回答在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根源和途径问题。本书的二位作者都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分属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长期在美国著名大学讲授 IPE 课程。在本书中,他们并未过多纠缠于 IPE 的学科属性,而是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出发,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国际关系不同理论流派、国际关系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之间,积极探求其沟通与融合之道,为建立 IPE 共同的研究纲领做出了积极探索。

经济问题、理论和方法在 IPE 中的作用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吉尔平认为传统 IPE 的核心关注是世界市场的兴起对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和演变的影响,以及国家试图影响市场力量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sup>①</sup>因而,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世界市场的逻辑、经济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是 IPE 的研究重点。但由于从事有关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政治学领域,缺乏必要的经济学理论背景,往往在研究中忽视经济学的逻辑,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老路。吉尔平本人也承认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得益于在普林斯顿向经济学家们请教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学。

尽管在美国主流学术界,IPE 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格里科和伊肯伯里教授在本书中并未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奉为圭臬,而是将其作为 IPE 理论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他们突出强调了 IPE 交叉学科的特征,将经济和政治真正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一般同类教科书偏重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不同,二位作者以两个独立的章节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有关理论作了梳理,其用意

<sup>①</sup> 参见: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1—15.

在于：既然政治经济学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政治分析，了解有关经济学理论才能避免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成为“聋子之间的对话”。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的根源、机制和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模型从比较优势和机会成本的角度阐明了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使资源和劳动得到最有效配置的观点。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自由贸易还可以产生其他收益，如鼓励创新和塑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国际贸易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为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乃至“世界社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基欧汉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李嘉图以降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经济理论具有共通之处。新古典贸易模型对李嘉图模型的一些过于简单化的假定做出了关键修正。针对现代贸易中出现的以外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和幼稚工业为由主张贸易保护的观点，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进一步指出为何在国家整体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同时，国内某些特定群体的处境会更糟。国家因此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还是继续选择自由贸易并对那些特定群体作出补偿，这些都是仅仅关注效率和互惠的经济学家难以解答的问题。同样，当今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也是各国之间互利动机作用的结果，但同时也面临金融危机蔓延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自主性降低等风险。只有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对国家整体及国内各阶层的利益与偏好作出分析，以此作为经济理论的补充，才能充分理解这些问题。

显然，在考虑市场与国家权力、利益的相互作用时，仅仅依靠经济学家的效率逻辑是不够的。回顾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家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假定，我们可以推论出国家只有通过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扩大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大小最终取决于其掌握财富的多寡。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主张通过生产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也使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自主性，关注自身在体系内的相对地位，避免过度依赖另一国家。也就是说，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会迫使民族国家为保证自身的生存而斗争。在此过程中，国家更注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收益分配，算计相



对收益的冲动超过了绝对收益。基于此,一些 IPE 学者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应该取代传统的外交与安全成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因为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已使权力的概念离不开经济基础的作用。<sup>①</sup> 通过对英国霸权兴衰和战后美国霸权与世界市场开放间关系的研究,霸权稳定论者则提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开放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只能有赖于开明的霸权国的存在。金德尔伯格在总结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世界经济实现稳定的前提是有有一个起稳定器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由一个国家来发挥这一作用。”<sup>②</sup> 吉尔平等人进一步强调了主导大国偏好的重要性:如领导国选择实行一套自由主义的规则,并借助强制、劝说、利诱等手段,则会促进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sup>③</sup>

然而,传统现实主义学派也具有教条化和对国际体系未来过于悲观的缺陷,对现实主义的补充和修正首先来自国际关系理论内部。面对关于美国霸权衰落后开放的世界经济是否会走向封闭的争论,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体系的未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基欧汉等学者接受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利己的理性行为体的主张,但同时指出,伴随着国际关系中复合相互依赖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也如国内社会一样,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讨价还价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应对“市场失灵”的情况。国际制度能够在合作过程中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欺骗行为的代价,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sup>④</sup> 也就是说,国际制度不仅仅依赖于霸权国,而且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和发展动力。同时,新自由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也在于霸权稳定论者在量度国家权力时,过分依赖有形的资源(如 GDP,

①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at War: Robert Gilpin’s Political Economy of Hegemonic War as a Critique of Waltz’s Neoliberalism”, <http://dana.ucc.nau.edu/~lmo5/econPDFs/war/PEWarCritique.pdf>, p. 14.

②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05.

③ 参见: R. Gilpi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K. Knorr and F. N. Trager (eds.), *Econ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Lawrence, KS: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77.

④ 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9—132 页。